

吴如嵩 著

孙子兵法



0120075

内 容 简 介

本书综观古今中外研究《孙子兵法》的成果，运用历史的、系统的研究方法，突破过去单纯平面图解的思维模式，把《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归纳为十六论，深入进行探讨，得出了一些引入深思的新结论，从而把《孙子兵法》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书中对《孙子兵法》修辞艺术的探讨，亦颇具独到之处。

孙子兵法新论

吴如嵩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100035)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京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125印张 153千字

1989年6月第1版 198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 000

ISBN 7-5065-0969-5/F·609

定 价：3.30元

社编号01—0004

目 录

绪论	(1)
安国全军的慎战论	(1)
谋深虑远的先胜论	(8)
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论	(17)
威加于敌的伐交论	(27)
纵深奔袭的突袭论	(37)
攻虚击弱的易胜论	(44)
示形动敌的致人论	(53)
因利制权的任势论	(61)
兵以诈立的诡道论	(70)
奇正相生的阵法论	(79)
用兵八法与十围五攻的常法论	(87)
令文齐武的治军论	(95)
五德兼备的将帅论	(107)
因粮于敌的后勤论	(117)
九地六形的军事地理理论	(125)
刚柔皆得的战道论	(134)
《孙子兵法》的修辞艺术	(151)
后记	(178)

安国全军的慎战论

自从周平王东迁洛邑，就进入了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当时的周朝王室无力控制分封的各国诸侯。各国诸侯在自己的封国内拥兵自重，形成一个个的独立王国。又由于这些封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实力强盛的大国都企图控制中小国家，这就发生了兼并战争，于是出现了大国争霸的局面。西周分封时的四百多个诸侯国（《吕氏春秋·观世》）到了春秋时代只剩下十四个较强的了。“霸必有大国”（《孟子·公孙丑上》），称霸的也就是争当诸侯之长的大国。先后出现了所谓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和楚庄王。在春秋时代的三百年中就发生大小战争四百八十三次。待到吴晋联盟、吴楚争霸、吴越争衡，已经是春秋争霸战争的尾声了。

从战史上看，孙武参加了破楚入郢的吴楚柏举之战，很可能还参加了吴晋争当盟主的黄池会盟，这有力地说明孙子是以吴国取威定霸为己任的。从《孙子兵法》中看，他曾不止一次地提

到“霸”。如说：“四五者，一不知，非霸王之兵也。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是故不争天下之交，不养天下之权，信己之私，威加于敌，故其城可拔，其国可毁。”（《九地》）

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不以绝对的态度看待战争。列宁指出：“我们认为必须历史地（根据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各个战争。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象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是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也就是说，它们有利于人类的发展，有助于破坏特别有害的和反动的制度……”（《列宁选集》第2卷668页）从历史发展的长河看，春秋时代的兼并战争正是列宁所说的这类国内战争。它反映了日益发展的经济对打破各自为政的封国割据局面、加强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往来、促进民族融合的迫切要求，并最终为封建制取代奴隶制、为国家的统一创造了条件。从这几方面看，孙子虽然主张的是兼并战争、争霸战争，但在客观上却是有其进步意义的，是值得肯定的。孙子主张的争霸，即争伯，也就是取得诸侯国的盟主地位。这个“霸”同今天世界上的霸权主义是不能随意比附的。

以上是孙子时代战争的背景，也是我们探讨和评价孙子慎战思想的依据。了解它，便于我们历史地、客观地评价孙子。孙子的慎战思想有着丰富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孙子慎战思想的立足点

作为兵家的孙子，在战争问题上头脑十分清醒，十分冷静，十分明智。在一部《孙子兵法》中没有一丝一毫黷武主义的气味，而是时时处处都不忘记兵凶战危，反映出谨慎从事战争的态度。他开章明义就指出：“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计》）这句话与其说是孙子为着重重视战争而强调研究战争，毋宁说是为着慎重对待战争而强调研究战争。

孙子之所以如此慎重地对待战争，是与他重民尊君的世界观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说，重民、尊君的观点乃是孙子慎战思想的立足点。

我们知道，春秋时代民本主义思想已经萌发，民众问题已经提到了重要的地位。《左传·桓公六年》写道，季梁对隋侯说：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左传·僖公十九年》又说：“祭祀，以有人也；民，神之主也。”以民为神，重民轻神，这是思想观念上的一大进步，一大解放。

孙子继承这一重民思想，他从军事角度多次向国君呼吁要以民为主，考虑民众利益。在柏举之战前，孙子反对兴兵攻楚，回答吴王的理由之一便是：“民劳，未可，待之。”（《史记·吴太伯世家》）在《用间》篇中，孙子对于那些在使用间谍问题上，由于吝惜金钱爵禄，以致不明敌情，而造成战争失败的将帅，深恶痛绝，说这种将帅是“不仁之至也，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非胜之主也”。这里所谓“不仁”，即对民众不仁；所谓“非人之将”，即不是民众的好统帅。

重民，固然是孙子慎战论的立足点，但更为重要的立足点还是他那以功利主义为核心的尊君思想。而且，重民与尊君在孙子看来是一致的，因而他常常把二者相提并论，他的名句“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地形》），就鲜明地反映了他的这一思想。既要保民，又要利主，这既是孙子考虑战争问题的出发点，又是他考虑战争的立足点。

孙子与先哲们如此注重民心向背与战争胜负的关系，那么，当时的民众对于战争是一种什么心态呢？旧的史学著作很少反映民众的言行、民众的情绪，而《诗经》这部先秦时代的诗歌总集中的大量民歌却反映了民众的呼声。从《诗经》中可以看到，当时民众对于战争有以下几种态度：

一是歌颂武功。如《兔置》写道：“纠纠武夫”是“公侯干城”、“公侯好仇（好助手）”、“公侯腹心”，极力赞美那些卫国保

家的将士，表现了当时民众崇尚武功的心理状态。又如《猗嗟》，描写一个妻子对丈夫的赞美，她赞美丈夫身材高大，威武雄壮，武艺超群，足以“以御乱兮”——平定叛乱，为国建功立业。在《伯兮》中，一位爱国妇女为自己那保家卫国、建立功勋的丈夫放声歌唱：“伯兮朅兮，邦之杰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意思是说，她的丈夫十分威武，是盖世的英雄，手拿长殳，保卫国王当先锋。可以看出，先秦时代整个社会是崇尚英武的。《左传》、《国语》中，找不到一个不乐于当兵从戎或者临阵脱逃的有关记载，这同后来，特别是宋明时代重文轻武、辱骂军人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社会风气有着天壤之别。

二是拥护正义战争，如《无衣》写道：“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不仅“与子同仇”——你我同仇敌忾，并且表示要“与子偕作”——一同出发，“与子同行”——共同赴敌。

《出车》是以周宣王北伐玁狁的战争为背景，颂扬大将南仲，表现出跟随南仲远征的一种自豪感。如说：“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平定玁狁之乱），执讯获丑，薄言获归”——俘获敌酋，进行审问，高奏凯歌，胜利归来。玁狁是威胁华夏民族安全的少数民族，周朝民众对于抵抗玁狁的侵犯是同仇敌忾的，是“上下同欲”的。《六月》反映了这种对战争正义性质的认识：“玁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而《采芣》则从行动上反映了人民愿随周宣王共御外侮的意愿。如说：“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启居，玁狁之故。”“岂不曰戒？玁狁孔棘。”

三是诅咒兵役徭役，反对不义战争。兵民对于无休止的战争是反对的、诅咒的，因为统治阶级为进行战争就必须强征赋税，致使田园荒芜，人民流离失所。如《击鼓》就反映了卫国百姓被强征入伍的哀怨：“土国城漕，我独南行”——修筑土墙和漕城，独有我被分配到南方去。“于嗟洵兮，不我信兮”——哀叹长期驻守没有归期，痛苦之极。又如《杕杜》写道：“女心伤止，

征夫遑止！”怨女伤心不已，怨恨周王朝把她丈夫征调去负担沉重的徭役。诸如“武人东征，不遑他矣”（《渐渐之石》）、“哀我征夫，朝夕不暇”（《何草不黄》）之类怨刺征役的呼喊，不胜列举。

民众对非正义战争是反对的，《东山》描写一个被强迫出征的士兵回乡途中的复杂心情，表示“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赶快换上一套便衣，再也不穿军装当兵从戎了。

上述周代民歌深刻地反映出，当时的民众与士兵对于不同性质的战争有着鲜明的不同态度。他们对于正义战争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对于非正义战争则是深恶痛绝的。由此可见，孙子把“保民”作为他慎战思想的立足点是有着极其深厚、极其坚实的基础的。

二、孙子慎战思想的主要方面

在保民和利主的前提下进行的争霸战争，孙子的慎战主张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不用武力而用伐谋、伐交的战略策略，达到“必以全争于天下，故兵不顿而利可全”的政治目的。当然这既能保民又能利主，且又能实现取威定霸的目的，因此，是上乘的战略策略，上乘的慎战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当政治、外交的推进受到严重阻碍，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孙子对于战争决策、战争准备、战争实施直至战争结束，都是主张慎之又慎的。

首先，战争决策要慎重。

孙子在《火攻》篇的一大段论述集中地、完备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故曰，明主虑之，良将修之。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这段话清楚不过地表明，孙子反对的是国君“以怒而兴师”，将帅“以愠而

致战”，而不是一般地反对战争。张预在《孙子注》中说得好：“君常慎于用兵，则可以安国；将常戒于轻战，则可以全军”。孙子此言不是无的放矢，而是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说的。当时，在战争方面，战或不战的决定权控制在国君手中；在战役战斗方面，打与不打的决定权掌握在将帅手上。这是有大量史料可以证明的。蹇叔哭师是国君专擅造成战争失败的一个著名史例。公元前630年秦晋两国联合攻打郑国，而郑国大夫烛之武对秦穆公的一席话竟拆散了秦晋的联合军事行动，使双方关系破裂。然而秦穆公急欲向东发展，又于公元前628年企图对郑实施远距离突然袭击。大臣蹇叔向秦穆公力陈要害，说明行军千里，难以保密，突袭不可能成功。但是，秦穆公一意孤行，怒骂蹇叔，不采纳他的意见。蹇叔无力挽狂澜，只好含悲忍痛哭送出征将士。战争果如蹇叔所料，秦军在崤山遭到惨败。相反，齐鲁长勺之战，因鲁庄公采纳曹刿的建议，冷静而谨慎地迎接齐国的挑战，周密而正确地部署战事，于是打了胜仗。

将帅“以愠致战”而导致战役失败，可以晋楚城濮之战的楚军统帅子玉为例。城濮之战是晋、齐、秦三大强国联合攻楚的一次争霸战争。面对三大强国的联合进攻，楚将子玉派使者宛春向晋文公提出要晋国允许曹、卫复国，然后，楚就解宋国之围的休战条件。晋文公一方面暗地答应曹、卫复国，但要其与楚绝交。另一方面，扣留楚使宛春，企图“执宛春以怒楚”（《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子玉果然被激怒了，不顾楚成王“无从晋师”（《同上》）的告诫，贸然挥军进击，结果大败。

孙子强调“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在他看来，发动不发动战争，进行不进行战争，关键就在于是否有利。换句话说，功利主义就是他战争观的核心。什么利？“掠乡分众，廓地分利，悬权而动。”（《军争》）兴不兴师，致不致战，就看对土地的扩占，对人口的奴役，对财物的掠夺利大还是利小。如果一场战争打下来，不能“安国全军”而是亡国破军，不是“分

众”、“分利”而是一无所获，或者即使“战胜攻取”，但又“不修其功”，弄得天怒人怨，那么这样的战争孙子是反对的。总之，孙子在战争问题上，决不主张做蚀本生意，而是要做费力最小却收效最大的战争交易。

其次，战争的进行也要慎重。

定下打的决心之后，接着而来的是付诸实施的问题。诸如战前准备要充分，“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九变》）；作战预案要周密完善，做到“未战而庙算胜”（《计》）；作战行动要稳妥，做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形》），自己必须先站稳脚跟，然后再考虑克敌制胜。孙子提出的“故自保而全胜”（《形》）就包含了既要消灭敌人，又要保存自己的朴素认识，也是他慎战观的具体表现。

“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孙臆兵法·见威王》），从孙臆以后的历代兵学家大都继承了孙子的慎战观。这一慎战观既区别于反对一切战争的和平主义者，又区别于穷兵黩武的战争狂人。孙子安国全军、保民利主的慎战论无疑是值得重视的，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其在军事学术史上的历史地位。

谋深虑远的先胜论

孙子的先胜观是他战略思想的一大组成部分。它观点鲜明，体系完备，影响深远，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下面，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先胜——古朴的智战战略思想

关于先胜问题，孙子有一句名言：“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形》）所谓“先胜”，从《形》篇本身的文意看，即指战前先有胜利的条件，先有胜利的方案，先有胜利的把握，反对打莽撞仗、糊涂仗。也就是他说的，作为将帅必须做到“料敌制胜，计险随远近”（《地形》），才是“上将之道”。如果广义地理解，“先胜”也可指在国防建设上必须先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强大的军队、精锐的武器、完善的装备，等等。

我在这里还是着重从《形》篇的本义来探讨孙子的先胜论。孙子从先胜思想出发，把战略策略分为四等：伐谋、伐交、伐兵、攻城。《渊鉴类函》征引《孙子兵法》的佚文又披露了一个上、

中、下三略的说法：“善用兵者有三略焉，上略伐智，中略伐义，下略伐势。”（《武功部·谋策》）三分法也好，四分法也好，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无论孙子讲“上兵伐谋”，还是讲“上略伐智”，核心都是一个“智”字。

智战战略问题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固然是国防建设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然而，它在我国古代也同样为兵学家们所重视。只是由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不同，因而军事技术手段不同而已。但在重视人才、重视智力的开发、重视高超的智谋等方面却是古今相通的。

孙子的智战战略思想有两层含意：一是预见性，所谓“未战而庙算胜”（《计》）；二是智慧性，所谓“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虚实》）。这里的“制胜之形”，既可指作战方式，又可指战略策略。总之，是根据客观情况，随机应变，灵活处置。孙子的高明之处就在这里，究竟有些什么奇谋妙策、龙韬虎铃，他一概采取引而不发的叙述，用他的话说，“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计》）。然而后世一些兵法之作则不然，比如《三十六计》竟把什么树上开花计、指桑骂槐计等等一一列出，是不可取的。

“攻人以谋不以力，用兵斗智不斗多”（欧阳修语），重智而不重力是中国军事学的一大传统。从军事题材的文艺作品中也可看出，中国人无不推崇《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水浒传》中的智多星，推崇他们的神机妙算，未卜先知，而这正是反映了我们民族在战略思想上的崇尚奇谋妙计的优良传统。

“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六韬·武韬》），从古代以来的战争历史就不断地讴歌那些雄略动如神的先贤们。应该说，孙子的先胜观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的。

孙子主张以“上智为间”（《用间》），用那些睿智聪颖的智谋之士担当战略侦察的重任，这正反映了他对智战的重视。他

举例说：“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

（《用间》）吕牙即姜子牙，姜子牙辅佐周武王灭商的故事，由于《封神演义》的广泛流传已为人们所熟知，我不想赘述。这里只把伊挚其人其事略加介绍，以加深我们对《孙子兵法》战略策略思想的认识。

伊挚又称伊尹，尹是官名。伊尹是商汤的右相，协助商汤进行了灭夏的鸣条（今山西永济县）之战。这次战争发生在公元前十六世纪初，比孙子诞生要早一千年。当时，商汤为了推翻夏桀残暴的统治，派伊尹深入夏都三年，侦探夏王朝的战略情报。伊尹又协助商汤制定了翦夏羽翼、争取民心、逐步壮大实力的策略。当看到夏桀政治腐败，众叛亲离，败亡之形已露端倪时，他即准确地判断灭夏的条件已经成熟、时机已经到来，于是请求商汤大举出兵。正是由于伊尹作了大量的、多方面的战略侦察工作，因此很快赢得了战争的胜利。早于孙子一千年的伊尹就有这样的深谋远虑，不能不使我们惊叹。无怪乎孙子竭力主张“未战而庙算胜”，后世的兵家甚至提出“贵谋而贱战”（《汉书·赵充国》），“以计代战一当万”（《晋书·杜预传》）。因为，它实在是军事斗争中的一柄利剑。

二、先胜——古老的战争预测论

预知胜负是先胜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孙子对此有不少精辟的见解。他在《计》篇中分析了“五事”、“七计”之后，两次提到预知胜负的问题，先说“吾以此知胜负矣”，后说“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现）矣”。这两句话在文意上有明显的不同，前者是指内谋于庙堂，即通过敌我客观条件的比较作出的判判；后者指外谋于战场，即在前者的基础上又加上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所得出的结论。他强调说：“故知战之地，知战之日，则可千里而会战。”（《虚实》）所谓“知战之地”，即预知在什么地方同敌人作战对我有利，对敌不利，为此就要预设战场、创造战场。所谓“知战之日”，即预知在什么时间同敌人作战对我有利，对敌

不利，为此就要等待战机、创造战机、抓住战机。

孙子战争预测的思想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无论是从战争实践中还是从军事学术上都可以找到证明。军事学术上萌芽形态的先胜观，似应在占筮中就已经形成了。例如《周易》中就记载了不少描写战争预测、战争准备方面的内容：

“师贞，丈人，吉，无咎。”（《师·坎下坤上》）大意是，战争正义，又有年长而有经验的老人做总指挥，战事一定顺利而无祸患。

“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师·九二》）大意是，主帅在军中，战事一定吉祥而无害。君王多次给予嘉奖。

以这两则记载为例，当我们剥开占筮所披的迷信外衣时，便可以看到西周时代就已经很重视通过敌我条件对比去预测战争胜负，从而确定战还是不战了。

从战史上看，毛泽东同志十分赞赏的齐鲁长勺之战应该是反映先胜观的一个典型战例。在《左传》的记述中，曹刿最有代表性的一句话就是“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左传·庄公十年》）。

“远谋”两字不可轻轻放过。在这次战役中，曹刿的一系列言论和行动正是“远谋”二字的生动体现。战前，他通过鲁庄公慎重处理诉讼案件而取信于民这一事实，预见到鲁军同齐军“可以一战”，决一胜负。在作战过程中，他看到齐军士气再衰三竭，锐气丧失，而鲁军士气饱满，于是，先是建议鲁庄公挥师出击，后又建议鲁庄公乘齐军辙乱旗靡之时乘胜追击。结果正如他所预见的那样，鲁军大胜。这一切充分显示出曹刿在作战指导上的远见卓识。

上述举例可以证明，前人在预测战争胜负方面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总结，为孙子建立其战争预测的理论、寻求战争预测的方法，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三、先胜——必要的侦察，正确的决策

毛泽东同志在评论《孙子兵法》时曾经抓住“知彼知己，百

战不殆”八个字发表过一段十分重要的意见，他说：“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这个评价是很高的，我们也不要看轻他这个评价。他这短短的一段话，高度概括了《孙子兵法》从了解、分析、判断敌情我情到定下决心、制定和实施作战方案的整个思维过程。

战争既是力量的竞赛又是智慧的较量。战争中，没有一定力量为条件，智慧再高也无济于事；反之，如果鲁莽灭裂，力量优势也会招致失败。孙子对待力与智二者关系的认识充满了辩证法。他既强调客观物质条件（“五事”、“七计”等），又重视人的主观能力，争取用奇谋妙策赢得胜利。所以，他不无自豪地说：“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败哉？”（《虚实》）

那么，孙子主张怎样去实现“先胜而后求战”呢？这可以从下述两个方面去分析：

（一）要相敌察机，五间俱起

了解敌情，获取情报，掌握敌人动向，是“先胜”的前提条件，十分重要。孙子所论述的了解敌情的方法大体可以分成三种：

一是“相敌”。“相敌”（《行军》）就是观察判断敌情，“相”在此训为“视”。孙子在《行军》篇列举了对三十三种具体现象的相敌方法，这些方法在今天看来已大部分过时了，但是，孙子那种通过现象观察来认识本质的思维方法却是对我们很有启发的。下面分类阐明之。

通过对敌人言论行动的观察以判断其作战意图。从言论方面看，如：“辞卑而益备者，进也；辞强而进驱者，退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来委谢者，欲休息也”。从行动方面看，如：“近而静者，恃其险也；远而挑战者，欲人之进也；其所居

易者，利也”、“轻车先出其侧者，阵也；奔走而陈兵车者，期也；半进半退者，诱也”。

通过对鸟兽草木和尘埃的观察以判断敌人的行动。如说：“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来者，营军也”。

通过对敌人活动状况的观察以判断敌人的劳逸、虚实、士气和补给。关于劳逸，如说：“杖而立者，饥也；汲而先饮者，渴也；见利而不知进者，劳也”、“吏怒者，倦也”。关于虚实，如说：“鸟集者，虚也；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关于士气，如说：“谆谆翕翕，徐与人言者，失众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之至也”。关于补给，如说：“杀马肉食者，军无粟也；悬缶不返其舍者，穷寇也”。

孙子的相敌之法，用《六韬》的话说就是：“望其垒则知虚实，望其士卒则知其来去”（《虎韬》）。在没有先进观察设备的孙子时代，将帅靠肉眼观察来实施当面指挥，相敌方法是有其特殊意义的。

二是派遣间谍。孙子特别重视间谍的作用，尤其重视具有“上智”素质的战略间谍，他说：“故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军之所恃而动也。”（《用间》）也就是说，他认为能不能实现“先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知敌之情”的间谍。孙子所指的这种起重大战略作用的间谍在历史上确实是存在的，除了前面我们谈到的伊挚、吕牙之外，我看战国时代的苏秦可谓中国战争史上乃至世界战争史上少有的战略间谍。新发现的长沙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证实，燕国自遭齐国军队攻下都城、大肆杀掠，险些亡国的沉重打击之后，燕昭王为了防止齐军攻燕以求发展壮大，便派苏秦到齐国进行间谍活动。苏秦受到齐国国君齐湣王的重用。他先是鼓动齐湣王发动合

纵攻秦，挑起齐秦矛盾。接着又怂恿齐湣王灭宋，这不仅把齐国的战略方向引向齐国南面的宋国，转移了齐国对北面的燕国的注意，同时，还促使秦、楚、魏、赵等国一致反对齐国。于是秦昭王亲自出面组织燕、韩、赵、魏，发动了震惊当世的五国合纵攻齐的济西即墨之战，取得了辉煌战果。苏秦在齐国的一系列反间活动直到五国伐齐时才败露，他也终于被车裂而死。

苏秦这种间谍，孙子称之为反间。反间是五间之一，其余四间是：乡间、内间、死间、生间。在《用间》篇中，孙子对如何对待和使用间谍、五间之间的关系等等，都有详尽的阐发，兹不赘述。

三是试探。孙子在《虚实》篇中谈到了四种试探敌人虚实的方法：“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文中的“策之”即策动驱使敌人，“作之”即挑动激怒敌人，“形之”即示形引诱敌人，“角之”即以兵试攻敌人。这是临战状态之下为了获取敌人情报而采用的四种方法。通过“策之”，进一步比较敌我作战方案的利弊得失；通过“作之”，进一步察明敌人的活动规律；通过“形之”，进一步验证敌人的部署状况；通过“角之”，进一步探明敌人的强弱虚实。这四种试探的方法都是战争经验的总结，并在战争实践中屡试不爽。例如试攻，即今所谓火力侦察，一般都以吴蜀夷陵之战为例。吴将陆逊通过试攻蜀军一个营寨，侦知了敌情，从而掌握了破敌之法。其实，试攻之法也是孙武对历史上战争经验的总结，例如公元前565年的汾之战中，楚国令尹子庚就提出试攻的意见，他说：“臣请尝之。若可，君（指楚国君主）而继之；不可，收师而退。”（《左传·襄公十八年》）。又如，公元前516年的齐鲁炊鼻（今山东宁阳县）之战前，齐景公的大臣梁丘据说：“使群臣从鲁君以卜焉。若可，师有济也，君而继之，兹无敌矣；若其无成，君无辱焉。”（《左传·昭公二十六年》）饶有意味的是，吴军破楚入郢的第二年，即公元前505年，秦国出